

全球化 4.0 时代全球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初探^{*}

苏 宁 屠启宇

[内容摘要] 21 世纪 2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标志着全球化进入 4.0 阶段。科技加速进步并持续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决定了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加速向更多元、均衡、可持续的全球化新形态转型。在技术变革、大国主导和国际机制等全球化核心机制调整的背景下,这一重大迭代深刻改变了全球城市作为全球化枢纽节点赖以运行的外部环境,城市发展模式、层级判定和竞争格局均发生重要转变,全球城市进入深度调整期。在全球化 4.0 阶段,全球城市的发展已经从流量枢纽功能主导向本土化、区域化、策源化和包容化运行逻辑调整,城市间的竞争范式转向“全能型”与“增量”竞争,并关注“安全韧性”的底线思维。全球城市网络关系呈现出节点关系独立化、对外联系二元化、网络结构层级化的三重演化新方向。“全球南方”城市与中国全球城市的创新路径为全球城市体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量与等级更新动力。

[关键词] 全球化 4.0 战略环境 全球城市 城市功能

[作者简介] 苏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屠启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6)02-0133-22

21 世纪 20 年代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显示全球化正在进入 4.0 版发展新阶段。在全球化运行及互动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环境下,作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 世纪世界城市化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6ZDA13920)的阶段性成果。

为国际经济运行枢纽空间节点的全球城市,其判定标准、发展逻辑以及相互关系亦相应地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因此,以动态演进的视角对全球化全面转型之下全球城市的新需求、新变化、新趋势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全球化4.0转型的内在逻辑以及对全球城市转型的传导机制为分析基础,考察新环境下全球城市个体与城市网络群体的转型逻辑与趋势,探讨新兴全球城市群体发展的意义与作用,为全球城市转型的路径提供探索性思考。

一、全球化转型:全球城市发展环境变化的核心逻辑

全球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根源于全球各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互动需求。而全球化,则是近40年来全球多领域互动的主要依托与基础条件。21世纪2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折射出全球化已处于阶段性转型的过程之中。这种国际整体环境的转折性变化带来的多层次重大影响,不仅涉及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深刻影响城市的发展动力、运行模式、互动机理,是观察与思考未来全球城市发展路径的前提条件与逻辑起点。

(一) 全球化加速向4.0阶段迭代的特征与根源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概念的形成与实践,深刻反映了国际大都市在全球经济、社会及政治体系中地位迅速提升并发挥核心枢纽作用的重要特征。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此类高度国际化城市实现互联互通与紧密互动的基础性条件。而这一基础性条件已呈现出新的演化特征。

1. 全球化4.0迭代的变化与阶段划分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显示出全球化已进入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新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内向化”“右倾化”“保守化”趋势加速推进。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连续退出多个联合国机构、对全球加征高额“对等关税”等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实质性冲击。2025年12月美

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控制西半球的“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①反映出其全球战略收缩与区域战略重心调整。欧洲保守倾向亦愈发显著，2024 年欧盟对中国新能源车大幅增加关税，折射出日渐加剧的产业保护与技术竞争趋向。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也进入新的阶段。2024 年，金砖合作机制吸纳沙特阿拉伯、埃及等五国加入，“大金砖合作”机制增强了“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力量。“南南贸易”在 2025 年上半年增长 8%，高于全球平均贸易增速 6%。亚洲和非洲预计在 2025 年实现最快出口增长。^②

表 1 全球化 1.0—全球化 4.0 阶段划分与特点

全球化阶段	分期	技术革命	大国主导	国际机制	一体化特征
全球化 1.0	1870-1914 年	第二次工业革命、运输	英国	金本位、殖民地体系	国际市场形成，资源、产业一体化
全球化 2.0	1945-1980 年	电力、核能、通信	美国	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体系	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制造业发达国家内部一体化
全球化 3.0	1980-2020 年	互联网、电子通信	美国	G7、G20	超级全球化，第二、三产业全球布局
全球化 4.0	2020-2050 年	数字技术、绿色低碳	中美并治	新治理机制、区域化、数字贸易新规则	再全球化，多元、均衡、可持续的共同体

资料来源：参考 World Bank,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 January 31, 2002,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954071468778196576/pdf/multi0page.pdf>; 郎昆、郭美新、龙少波：《数字经济与新型全球化：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海经济研究》2023 年第 7 期，第 103 ~ 107 页。

上述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反映出全球化推动力量、合作机制、发展方向等维度的全面转型，而对这一变化趋势的理解，需从全球化演进的阶段划分与特征内涵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5,”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p. 5.

^②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I Goods and Frontloading Lift World Trade in 2025 but Outlook Dims for 2026,” October, 2025,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5_e/stat_07oct25_e.htm;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Trade Outlook and Statistics Update: October 2025,” October, 2025,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5_e/stat_07oct25_e.pdf.

入手,方能确定变化趋势所处的历史方位及未来走向。如表1所示,借鉴世界银行的全球化分期,本文认为,根据技术、经济、政治因素的发展特点,全球化进程可划分为4个阶段。^①2020年以来,全球化正在由3.0阶段加速向4.0阶段转型,未来一个时期是4.0新周期的形塑发展阶段,这种转型的特征在2024—2025年已充分表现。其总体趋势是从3.0阶段效率导向的“超级全球化”阶段,向“多元、均衡、可持续”导向的4.0时代转型。

2. 全球化迭代的根源与性质

从根源上看,全球化3.0阶段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升级与激化,是促使全球化发生阶段性变革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跨国公司主导、要素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给全球经济带来的结构性矛盾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便已暴露无遗,其后日益加剧,并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跨国公司推动供应链全球布局与国际分工的深化,造成产业布局与财富分配在空间与阶层上的急剧分化,在缩小国家间经济鸿沟的同时,反而导致全球化参与主体的内部社会不平等与极化加剧,^②带来全球化的“社会分配不可持续”难题。

其二,跨国公司建构的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全球生产与消费体系,在快速提升生产规模与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带来全球能源与资源空前规模的快速消耗,并引发全球变暖等全球性环境治理危机,进而带来全球化的“环境资源不可持续”难题。

21世纪10年代以来,欧美一系列“逆全球化”思潮与政策,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的博弈,其实质正是各类经济体对全球化3.0两大核心问题的反应与调整。2020年发生的新冠疫情则极大地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促使地缘政治因素与技术因素交错叠加,引发各国经济政策普遍出现“内向化”的整体转向、国家与企业高度注重产业链

^① World Bank, “Globalization, Growth, and Poverty : 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 January 31, 2002,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954071468778196576/pdf/multi0page.pdf>.

^② 张月友:《新型经济全球化》与“慢球化”的理论表征及相容性分析,《学术论坛》2025年第3期,第21页。

供应链安全、数字技术加速应用等一系列重大变化,推动全球化加速转型。

从本质属性上看,全球化 4.0 是对 3.0 阶段“超级全球化”形态内部固有矛盾的修正,是“再全球化”,而非“逆全球化”。在国际分工体系深化重构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仍是世界经济合作的根基,全球化的总体态势仍将得以维持。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将围绕上述两大核心问题的解决,在技术革新、机制转换、动力重塑等条件下整体换挡转型,并促使全球要素在空间分布、流动方式、分配机制上的重新配置,进而改变国际经济互动模式、力量对比格局、社会交往范式、发展理念导向。

(二) 全球化 4.0 迭代的演进机制与主要表现

1. 以“技术变革、大国主导、国际机制”为核心的迭代机制

全球化 4.0 转型主要受技术变革、大国主导、国际机制三个核心要素影响。^①这三要素对于全球化转型的作用,体现为全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重大调整。

从生产力角度看,技术变革为全球化转型提供了动力与发展增量。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推动全球经济效率提升,并带动多领域产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已展现出与高技术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并对服务业产生颠覆性影响。另一方面,绿色低碳技术的突破与广泛应用则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而破解全球化 3.0 阶段的环境约束问题。在生产力结构上,数字技术有助于解决生产力变革的“工具机”问题,提供新质工作机械与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技术则有助于解决“动力机”问题,提供可持续性的新能源与新动力体系,进而实现全球化 4.0 的发展动能转换。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全球经济互动关系主要由大国的政策选择以及竞争态势所塑造。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本质上是国际生产关系取向的较量。美国谋求构建“小多边、友岸外包、部落化”式国际生产分工机制,^②而中国则致力于推

^① 郎昆、郭美新、龙少波:《数字经济与新型全球化: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海经济研究》2023 年第 7 期,第 107 页。

^② 宋国友:《美国的逆行与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 年第 1 期,第 83 页;刘昌明、赵敏:《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7 期,第 36 页。

动“大多边、非脱钩、包容性”的国际经济发展与全球生产分工机制的构建。^① 在大国博弈过程中,全球化4.0的运行逻辑发生质变,其根源在于地缘政治逻辑对市场经济逻辑的系统性影响,进而使全球化3.0形成的跨国生产网络的运行成本与风险代价剧增,具有全球规则效力的国际经贸与治理机制作用趋于弱化。

2. 全球化4.0的主要表现形式

其一,全球化运行模式受大国竞争加剧与国际机制弱化叠加影响,要素流动模式由全球自由流动向“有重点”“有限制”流动模式转变,美西方“去风险化”“友岸、近岸外包”等政策影响跨国公司投资的地域选择,使要素流动速度趋缓,流向空间选择减少,国际经济增长已经进入慢速区间。联合国《202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25年的2.8%放缓至2026年的2.7%,2027年将温和改善至2.97%,但仍低于疫情前3.2%水平。^②

其二,全球化技术动力受国家间技术博弈影响,由跨国公司主导向国家与跨国公司共同推动转变,科技竞争的“体系化”特点更为明显,竞争从前沿技术研发全面扩展到工程能力、供应链、人才体系和研发组织方式等综合能力领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5年科学、技术与创新展望》报告提出,“战略自主”与“技术主权”等概念已成为发达国家科技政策日益关注的重点。欧盟《经济安全战略》、日本《经济安全行动计划》等经济安全政策鲜明体现出这一特性。^③

其三,全球化合作取向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由“效率优先”向“安全—效率”兼顾的多元联动转变。主要经济体与跨国企业将冗余度视为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

^① 21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主张推进多边、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2024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上讲话中提出,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里约热内卢G20领导人峰会的讲话中指出,要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参考《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2024年10月23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82368.htm;《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24年11月19日,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8041.htm。

^②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6,” January 8, 2026,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file/21554/download>, p. 5.

^③ OECD,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utlook 2025,” October 7, 2025,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5/10/oecd-science-technology-and-innovation-outlook-2025_bae3698d/5fe57b90-en.pdf, p. 65.

重要原则,产业链供应链的多中心格局逐渐形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显示,2020—2022 年间,流向欧洲的战略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是流向亚洲国家的近两倍,这一现象在研发和半导体等战略性产业投资中尤为明显。^①

其四,全球化规则体系在既有国际机制弱化情况下由“全球治理 + 多边机制”结构向“治理碎片化 + 区域合作”转变,国际经贸关系政治化与区域化特征加强;在缺乏多边机制协同的情况下,全球重大风险的治理难度显著增加。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 2026》显示,50% 受访者对 2026—2028 年风险前景预判为“动荡”或“灾难”,面向 2036 年的比例增长至 57%。^②

其五,全球化力量结构在技术扩散与大国力量对比变化条件下由美西方主导向“中美共治 + 全球南方”的多极化方向转变,全球南方群体对于全球发展的增量意义不断提升。2023 年,“全球南方”国家 GDP 已占全球的 42%,货物出口占比 44%,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占比达 65%。^③

二、全球化 4.0 转型对全球城市的影响机制

全球化多领域的变化,从技术、主体、环境三个维度对城市系统产生深刻影响,改变了全球城市发展的网络依托、主体结构与发展导向。全球城市的运行逻辑与发展基础面临从底层架构到功能体系的全面重构。

(一) 全球化 4.0 对全球城市的传导机制

1. 技术传导:从单网连接到双网互动

技术变革作为推动全球化 4.0 迭代的生产力因素,是促使全球城市转型的关键动力。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术、新能源等新技术的应用带来全球生产与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23: Navigating Global Divergences,” October, 2023,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3/october/english/text.pdf>, p. 95.

^②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Risks Report 2026,” January 8, 2026, https://reports.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s_Report_2026.pdf, p. 22.

^③ UNCTAD, “Rising Global South Needs Development Rethink to Continue Momentum - UNCTAD Deputy,” November 6, 2024, <https://unctad.org/news/rising-global-south-needs-development-rethink-continue-momentum-unctad-deputy>.

创新体系的重大调整,也带来国际要素流动的结构性变化。人工智能、数字服务、先进通信、新能源产业的技术要素投入水平较高,产业体系与研发部门具有更强的空间紧密度,其生产、研发、运营在空间上的分散化趋势不显著。这就使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与配置能力,成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控制力的核心要求。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全球城市的节点属性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服务中心,进一步扩展至全球创新要素的配置中心。全球城市的服务能力需要兼顾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创新网络双重功能,新的要求将导致全球城市群体出现新的分化。

在科技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焦点的情况下,技术要素的跨国流动模式由市场逻辑转为安全导向,创新隔离和人才锁定效应使全球城市的跨国知识溢出功能受到约束,城市创新体系的发展更趋依托地区性创新资源与科技集群。全球城市从资本要素中心到技术要素配置中心的升级过程中,更为注重与本土及区域产业、技术主体的互动,促使城市产业体系的全球导向向生产-研发“全球地方化”导向调整。

从技术变革的空间需求角度看,数字、绿色技术与产业的加速融合,也为全球城市形成战略性技术创新空间带来新的机遇与需求。全球城市在人才、资金、研发、技术应用场景方面的优势,使此类城市具备担当新技术原创与应用关键性战略“支点”的重要条件。中、美等技术与经济主导型国家的首位城市与枢纽性城市在技术与产业创新与应用方面的优势条件更为明显。因此,全球城市的科创功能需要围绕关键性技术进行有针对性地重整与适配,进而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2. 主体传导:从离岸配置到本土融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城市的功能构建主要基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的专业服务需求。而全球化4.0环境下大国竞争引发的地缘政治因素,极大影响了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城市驱动主体的行为模式。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策略中,对于安全的考虑上升到新的高度。同时,跨国投资受到母国与东道国更严格的双重审查与监管,进一步抑制了跨国公司域外投资经营的意愿与选择。跨国公司通过海外投资,以产业内、企业内贸易促进国际贸易的模式受到重大约

束。2024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量下降 11%,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量下降了 22%,其中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 58%。^① 2025 年上半年,全球跨境并购数量同比下降了 23%,亚洲区域下降了 67%。^② 跨国公司经营导向的“安全化”转向,大幅压缩了跨境投资的规模与范围。企业主体对于“离岸”专业服务需求整体缩减,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球城市作为跨国枢纽的需求侧基础,进而迫使城市核心功能结构进行新的调整。

在外部投资与要素流动受限的情况下,各国更重视本土经济的稳定增长。产业政策回归已成为全球经济普遍现象,各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监管、公共采购等多种手段加速技术转型,积极提升本土战略产业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统计,2017—2024 年期间,全球支持本土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行为增长了近 390%。^③ 2024—2025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产业计划投入近 1.29 万亿美元,^④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清洁能源、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上游领域。^⑤ 相应地,国家对于主要城市担当本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增长极”角色和对本国及区域经济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都提出更高要求,并从政策、资源层面提供新的支持。从发展动力视角看,跨国公司与国家两类主体对于全球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3. 环境传导:从平稳确定到复杂多变

国际机制保障下稳定的国际经贸与全球治理环境,曾是全球城市快速发展与城市网络构建的基础。而全球化 4.0 阶段日趋“碎片化”的国际机制,给全球城市发展带来更为复杂多样的国际经贸与治理环境,进而影响全球城市的发展

① UNCTAD, “2025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June 19, 2025,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5_en.pdf, p. 7.

② 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49: Downturn in Global Investment Persists in Early 2025,” October 28, 2025,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iaif2025d2_en.pdf, p. 1.

③ Cindy Levy et al., “From Protection to Promotion: The New Age of Industrial Policy,” May 16, 2025,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geopolitics/our-insights/from-protection-to-promotion-the-new-age-of-industrial-policy>, p. 2.

④ OECD, “Quantifying Industrial Strategies,” <https://www.oecd.org/en/topics/quantifying-industrial-strategies.html>.

⑤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Rewiring GVCs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 December 15, 2025,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gvcreport2025_e.pdf, p. 240.

导向。在国际经贸合作机制方面,尽管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机制仍在维系既有国际贸易体系,但规则效力正不断下降。《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墨加协定》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新兴区域经贸合作机制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2019年生效时只有22个缔约国,至2025年已扩大到55个国家,非洲自贸区成为全球成员国数量最多的自贸区。在区域贸易协定之外,“未来投资与贸易伙伴关系”等更小规模、更灵活的跨区域国家联盟进一步增加了经贸合作机制的多元化特性。^① 自由贸易协定规则体系中,各方普遍重视本土经济利益以及安全因素的影响。这使全球城市需要面对更为复杂多样的投资贸易环境,城市间经贸合作网络运行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大为增加。同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兴贸易规则的签署,则对城市贸易功能的创新与适应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全球城市需在维系既有经贸活动规模的同时,系统性地调整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制度架构等要素配置能力,针对性地优化金融、贸易、航运等核心功能服务定位,全面参与并适配新型经贸规则与区域治理框架,进而获取增量经贸资源。

在全球治理层面,大国合作意愿的下降与既有治理机制的弱化,导致军事冲突、难民危机、恐怖袭击、极端气候、全球疫情、网络攻击等重大跨国风险的发生概率加大,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难度升高。全球城市作为高度国际化的枢纽空间,正面临相较于以往更为多样化、频繁化与显著化的外部冲击威胁。在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环境下,全球城市的发展策略除关注增长与效率外,还亟须将风险“适应”与“韧性”纳入核心考量因素。

(二) 全球城市发展的基础条件变化

全球化4.0 新局下技术条件、企业主体、环境因素的结构化变化,使全球城市功能与属性认知的基本条件发生相应变化。

全球城市概念的初始认知与实践根基,^②主要源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

^① Ovais Subhani, “14 Smaller WTO Members, Including Singapore, Tie Up to Support Open and Fair Trade,”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16, 202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business/14-smaller-wto-members-including-singapore-launch-partnership-to-support-open-and-fair-trade>.

^②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生产体系在地域层面的分散化特征,以及经营控制和高端服务功能在空间维度的集中化现象。其内在逻辑在于,全球化发展越是深入,生产体系分散化程度越高,以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服务功能在少数全球城市的集聚程度亦随之升高,投资国际化和金融证券化进一步促进了空间集聚的形成。全球城市由此承担起企业与政府机构购买金融、专业服务产品的跨国市场职能,经济结构高度服务化,城市功能与战略作用偏重“离岸平台”效应的发挥。通过这种服务性功能体系,全球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的战略性空间。^① 全球城市的增长及其功能能级提升与城市间服务网络的拓展高度关联,城市不再是“单独存在的实体”,^②而是依赖于网络互动的空间主体。

而在全球化 4.0 阶段,这种生产分散化与服务功能集中化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生产体系角度看,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导致要素流动阻力增大,各国产业政策的“国家主义”色彩加剧,生产体系布局与所在国本土需求之间的关联度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的“近岸”“友岸”趋势不断强化,全球生产的分散化趋势受到抑制,全球城市长期以来依托的“离岸”服务需求不断下降。

在动力主体上,跨国公司的群体结构与行为方式发生了新的调整。一方面,大量欧美跨国公司受制于母国地缘政治与安全因素影响,国际投资自主性下降。而另一方面,欧美企业的疏离为新兴经济体本土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机遇,本土企业的成长与海外业务拓展为新兴全球城市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但新兴跨国公司投资、经营的模式与业务领域,以及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层次与规模,与欧美企业相比有较大差异。这使全球城市侧重专业服务业的功能设定面临结构性挑战,法律、会计、金融等行业主导的服务体系难以支撑城市在新环境下的发展动能需求。

同时,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重塑服务交付模式。远程协作、智能合约等技术的应用削弱了服务业地理集聚的必要性,全球城市仅凭专业服务的集聚能力便成为“不可替代战略节点”的路径受到挑战。跨国公司的群体结构与服务需求

① Saskia Sassen,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2006, p. 196.

② Ibid., p. 7.

转变,改变了全球城市“战略性空间”的内涵,城市的战略性更多取决于在多极化格局中的多层次、多领域协同能力,而非特定专业服务需求的“集中化”提供能力。

国际要素流动模式的转变与要素配置的本土化优先导向相互作用,使全球城市作为全球要素流动枢纽的“中介”功能呈现相对弱化趋势。全球城市难以继续依赖“平台”功能,通过外部要素的“规模流转”模式驱动城市高速发展,亟需系统考量如何深化国际资源与本土要素的融合互动机制。在网络关系层面,全球城市对跨国网络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愈发依赖周边区域的次中心城市及腹地资源支撑,以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韧性与系统冗余度,从而改变城市的单极发展模式。这也促使全球城市开始积极探索“城市—区域”层面的都市圈、城市群等多层次合作策略。

三、全球城市体系的转型方向与路径

在全球化转型趋势下,全球城市对于新环境的响应与转型,将在城市个体、群体以及网络三个层面展开。在城市个体层面,全球城市运行逻辑经历新的调整;在城市间关系层面,城市竞争领域和维度出现新的拓展;在城市网络层面,网络结构与节点特性发生新的变化。

(一)全球城市发展新趋势

1. “本土化”趋势

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近岸化”“友岸化”布局趋势,以及新兴跨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导向与竞争格局变化,为更多国家带来本土企业增量服务需求,并提升了内部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企业主体需求的结构变化,叠加各国重视产业安全韧性、偏重本土主体培育的政策导向,促使全球城市的服务重心从原本侧重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与附属机构,向兼顾国际、国内两类企业主体转向。全球城市的枢纽功能将进一步强化“本土”根植特性,形成本土与国际两个市场服务能力兼备的功能体系。

全球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进一步助推了“本土化”趋势。一方面,主

要大国基于新的竞争需求,对全球城市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目标的契合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更有效地发挥其枢纽功能及综合影响力。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政策的“内向化”倾向增强,无形中提高了全球城市对外交往的制度约束力度。这促使全球城市的发展更趋依赖本土资源的支持,并对本国战略进行积极响应,以提升对本土要素、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的创新运用与整合能力。如伦敦市 2025 年发布的《城市增长规划》就明确提出配合担当英国《投资 2035》产业战略重要角色,探索强化前沿创新体系与先进制造能力,支撑国家产业政策的达成。^①

2. “区域化”趋势

在全球化 4.0 阶段的经贸合作体系中,区域性经贸互动逐渐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方式,多双边、多元化与更为灵活的区域合作模式对全球多边经贸体系形成重要的补充作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经贸合作规则的推进与区域经济互动规模的提升,促使全球城市的对外合作与服务重点转向周边区域。能够有效发挥区域节点功能的城市,将集聚更为稳定的跨国要素流量,并充分利用周边经贸网络的增长潜力,保障城市发展的稳定性。区域化趋势背景下,全球城市将进一步强化与区域内城市的跨境经济联动机制,通过更具时效性与灵活性的制度对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产业链协同等措施,构建区域性创新网络与服务体系,促进区域技术、资本、人才的高效流动。

基于新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城市间的区域性合作与功能匹配模式正在重塑。如 2025 年 2 月,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启动合作,建立面积为新加坡五倍的“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旨在加强供应链连接,注重吸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先进制造、绿色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战略投资。^② 这一合作项目鲜明反映出新加坡抢抓东亚产业链与制造业体系变革机遇的竞争新策略与跨境空间联动思路。

^① Mayor of London, “London Growth Plan,” June, 2025, <https://growthplan.london/wp-content/uploads/2025/06/london-growth-plan.pdf>, p. 65.

^② The Singap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The Johor-Singapore SEZ - What Businesses Need to Know,” May 29, 2025, <https://www.edb.gov.sg/en/business-insights/insights/the-johor-singapore-sez-what-businesses-need-to-know.html>.

3. “策源化”发展

在国际科技创新“体系化”竞争的背景下,各国对构建自主可控科创体系予以高度重视,技术的跨国流动受到复杂地缘政治因素制约。单纯依赖集聚外部创新要素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路径面临困境。在此形势下,全球城市需着力依托本土科研机构与包容性创新环境,构建植根本地资源禀赋、体现自身特色的“策源型”科技创新中心,通过强化本地创新体系实现与全球创新网络的深度嵌合,融入更为宏大且良性的创新生态系统。^①如纽约市2023年《纽约市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在2023—2025年推动七项人工智能发展策略,使人工智能技术充分应用于城市治理、公共管理等多领域。^②全球城市的能级水平,不再仅取决于跨国资本集聚能力,而受技术研发、数字流动、综合应用与系统集成等多维创新策源协同能力影响。

全球城市的策源作用还体现为大都市区、城市群尺度上的区域创新体系带动能力。全球城市科创体系与战略产业集群的有机互动将超越全球城市的行政与经济边界,形成带有“社群”属性的区域跨界科创连绵带。^③全球城市与制造业中心城市间的互动也随之经历结构性调整。全球化3.0阶段全球城市经济活动高度集聚而制造业严重衰退的现象得以扭转。以策源能力为核心的全球城市与既有或新兴制造业中心城市之间形成有机协同,共同构建基于稳定产业链体系的城市集群。这种城市关系的重构将推动全球城市—区域形态向新阶段演进。

4. “包容化”发展

全球化3.0阶段要素高速流动所引发的社会分配失衡与极化现象,在全球城市中集中显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反移民浪潮等此起彼伏的社会冲突,凸显了全球城市在汲取全球化流量红利的同时,亟须通过包容性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实现发展成本补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自2016年以来,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纽

① 周振华、高鹏:《基于全球城市网络的城市竞合关系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2期,第50页。

② New York City, “The New York C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ion Plan,” October, 2023, <https://www.nyc.gov/assets/oti/downloads/pdf/reports/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ion-plan.pdf>.

③ 曹湛、戴靓、吴康:《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地理研究》2022年第4期,第1081~1083页。

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等少数族裔政治领袖的当选与连任,以及城市政策向族群多样性与民生领域的资源倾斜,标志着全球城市在新发展环境下,积极推进以民生保障、社会公平与公共安全为核心导向的城市包容性发展战略转向。包容性问题普遍成为全球城市新一轮中长期规划中的核心议题。如东京都政府发布的 2024 年版《未来东京》长期规划中,将“以‘人’作为增长的源泉”作为首要原则,提出增强社会包容性,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包容性社会。^①

全球城市的包容性发展,还反映在经济发展的包容普惠上。消除技术与财富鸿沟,保障各社会群体平等参与、共享经济成果,已成为全球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如悉尼在《2025-2035 经济发展战略》中,就将共享经济成果的包容性增长作为经济战略的主要原则。^②与此同时,包容导向的发展逻辑,不仅为全球城市提供应对社会负面因素的策略,还将带来新的人才与人力资源增量。在各国保守主义政策强化以及科技创新“政治化”“武器化”加剧的态势下,跨国移民与高技术人才的流动受到极大影响。在此情形下,具备较高社会包容度的全球城市,将对此类群体产生独特的吸引力,从而吸纳更为多元化的人力资源,维持并提升城市的活力与增长潜力。

(二) 全球城市竞争新维度

1. 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化与城市间的“全能导向”竞争

从演进关系上看,全球化 4.0 与 3.0 之间并非完全互斥与否定关系,而是调整与升级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经贸体系与新兴规则体系之间保持着叠加转型状态。在这一环境下,全球城市间的竞争首先体现在对多体系、多规则并存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上。全球城市经济体系需兼具制度弹性、规则创设与跨体系协调能力,以同步适应多边框架、区域贸易协定及新兴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需求。全球城市既要维系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的枢纽地位,又需在数字治理、绿

^①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Future Tokyo: Tokyo’s Long-Term Strategy Version Up 2024,” January, 2024, https://www.english.metro.tokyo.lg.jp/documents/d/seisakukikaku/versionup2024_en, p. 7.

^② City of Sydne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2025-2035,” January, 2025, <https://www.cityofsydney.nsw.gov.au/-/media/corporate/files/publications/strategies-action-plans/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y/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y-2025-2035.pdf?download=true>, p. 16.

色低碳、人才流动等新规则领域形成“多轨合规”的创新对接能力。这种复合型能力水平,成为新环境下对全球城市地位评价的重要前提。

在功能体系方面,为有效响应内外环境的多领域需求与挑战,全球城市需在确保流量枢纽与国际交往门户职能的基础上,兼具基础设施韧性、数字治理能力、绿色低碳转型、多元文化融合及公共服务等多领域保障性功能与在岸服务能力。这种“全能型”发展导向,将促使全球城市的竞争焦点由以往侧重专业服务能力的单一优势竞争,向功能体系完善的综合性竞争方向演变。

2. 技术变革加速与城市间的“增量赛道”竞争

技术变革的快速演进与广泛应用,为全球城市竞争开辟了多元化新赛道与创新技术应用场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具有颠覆性意义技术的规模化部署,为城市迭代更新注入了新型技术动能与基础支撑。新能源技术的深度应用,有助于全球城市系统性地摆脱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约束,切实转型为“碳中和”枢纽城市。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为城市产业升级与社会转型提供了效率提升工具,还能通过全面高效的分析能力,揭示并呈现易被人类视角忽略或难以感知的城市发展维度与运行逻辑。以低空经济为代表的技术驱动型新经济形态,在创造新兴经济增长机遇的同时,也为城市交通、社会服务等基础功能领域开辟了突破性发展维度与重要增量空间。全球城市依托其资金、技术、空间等要素优势,持续加大此类领域的投入与建设力度,将推动城市竞争格局从零和博弈向增量竞争模式转变。

全球城市的中长期竞争赛道则聚焦流量枢纽与创新策源两大核心功能交叉的新兴行业,如金融流量与数字技术结合带来的金融科技、数据流量与文化创新功能结合带来的数字文创体系,以及数据交易、艺术金融、绿色金融等具有“跨界”交汇属性的新行业领域。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是全球城市破解流量零和博弈难题,在新竞争格局下实现增长的潜在“破局点”。

3. 全球风险累积与城市间的“安全韧性”竞争

在全球治理体系效能弱化、美国等治理主导力量提供公共产品意愿急剧下降的背景下,全球性风险的发生概率显著提升。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

新技术负面效应等不确定性因素持续累积,使全球城市需更侧重“安全”与“效率”的综合平衡,重新规划城市功能配置与空间布局。新冠疫情等重大冲击事件表明,全球性风险极易通过社会民生、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引发全球城市核心功能停摆,致使高度国际化城市付出更为沉重的经济社会成本。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转型阶段,全球城市发展需更加注重底线思维,通过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安全韧性体系,保障城市发展的稳定性。安全韧性体系不仅是城市抵御外部冲击的有效机制,更是以稳定发展环境吸引国际资本、高端人才与产业,确保全球城市在竞争中获取战略主动权与发展优势的重要基石。

在风险应对思路上,全球城市需通过系统性思维,统筹规划提升经济与社会体系应对冲击的韧性水平与冗余能力,在保障经济可承受前提下,构建风险快速复原机制。联合国《危机韧性与城市未来》报告提出,城市韧性的建构需协调城市规划、社区力量、数字技术、包容性治理、城市财政等多领域力量。^① 这表明,在机制层面能够实现经济、社会、交通、环境、卫生、安全等多领域系统性协同响应、在空间维度上能够超越行政边界,在大都市区、城市群引导部署区域安全协作体系的全球城市,将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具备更强的发展韧性与稳定优势。

(三) 全球城市网络关系的新变化

1. 节点属性“独立化”

在“去风险化”与供应链重组导向的影响下,基于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全球城市网络与城市节点关系的内在机制产生了较大变化。专业服务业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等分支机构更多服务于东道国区域内业务,与外部联系强度下降,这就导致此类机构的国际经济互动能级实质性下降。这一趋势鲜明地体现在美欧跨国公司对中国业务广泛采取的“中国+1”策略上,产能与供应链在中国与周边区域多元化布局的防御性策略导致企业运营机构数量增加,管理的范围、能级与效率相对下降。跨国公司的行为改变,使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再完全基于原有的跨国投资、生产和贸易体系,城市网络节点的独立性更强,网络互

^① ESCAP & UN-Habitat, “Crisis Resilient Urban Futures: The Future of Asian & Pacific Cities 2023,” October, 2023, https://unhabitat.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0/escap-2023-fs-future-asia-pacific-cities_2.pdf, p. 13.

动关系更趋多元。

2. 对外联系“二元化”

从城市网络的结构特性视角分析,在全球城市本土化与区域化属性增强、要素流动日益区域化的背景下,高等级全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间的互动关系呈现二元分化态势。高等级全球城市凭借长期积累的枢纽功能优势,持续巩固在全球经贸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此类城市虽保持全球连接能力,但其关联城市的群体规模呈现收缩态势。次中心城市受限于国际合作环境与自身能级,直接对接全球经济网络的能力相对弱化。与此同时,基于韧性供应链构建与本土产业链发展的内在需求,次中心城市与本土城市间的协同合作关系显著强化。依托核心门户城市开展国际互动的城市网络形态正逐步回归。

3. 网络关系“层级化”

地缘政治竞争使国际规则碎片化,使城市互动依托的经济网络进一步板块化与阵营化。全球城市的网络合作导向更趋向选择性开放与排他性联盟,网络的流动性降低,结构刚性增强。城市节点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连通规模,更反映为所处层级位置的战略地位与不可替代性,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互动模式从普遍连通转向战略性嵌入。在新一轮经济环境重构过程中,具备产业链主导性、数据主权掌控力和科技资源集聚力的中心城市的控制力进一步强化,而次中心与边缘城市的地位则面临被进一步锁定的风险。在上述网络结构变化的趋势下,节点城市之间的关系,由原本相对平等且独立的伙伴关系,向更具等级差异的层级关系转变。从整体格局看,全球城市体系在城市表现分化情况下,显现出新的“中心—边缘”特性。由此导致全球城市间的网络节点关系,呈现向以控制力与层级性为特征的世界城市体系回归的趋势。

四、全球城市的增量来源与等级变动

发展环境与动力机制的重大变化,推动了全球城市群体结构的动态调整。这一调整主要体现在群体增量与等级结构两个维度上。“全球南方”国家城市的

发展,成为全球城市体系增量的重要来源。中国全球城市的创新实践,则为全球城市等级跃升路径提供了新的范式选择。

(一)“全球南方”城市的增量意义

在全球化转型的背景下,构建新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寻求新的发展增量成为主要经济体的共同选择,这也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城市群体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经贸区域化、产业链重构过程中,亚太、拉美、中东等大国竞争的“中间地带”,将形成更为多元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而为更多“全球南方”城市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提供契机。同时,大量“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城市,在基础设施、社会建设、技术应用、对外联通等方面仍有巨大的成长潜力与发展需求。这又为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量与合作空间。在既有全球城市群体结构呈现分化态势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城市的发展及能级提升,将为城市体系的转型注入重要的新动能。

“全球南方”城市间的网络化互动与合作,有助于完善全球城市网络的节点布局与功能体系。现有全球城市网络主要基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构建,其城市节点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不均衡性,高度集中于欧美地区,且城市节点间的能级存在较大差距。“全球南方”城市网络的构建与深化发展,将对全球城市网络形成区域层级与发展维度上的重要补充,有效增强网络体系的稳定性与区域覆盖的全面性。新兴节点城市数量的增长,不仅能为欠发达与发展中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增长极,也有利于既有枢纽城市拓展合作群体,增强网络互动与协同的广度与深度。

(二)中国探索全球城市的等级提升路径

在全球化迭代的背景下,全球城市的等级体系将发生新的分化。在区域化、本土化趋势的影响下,部分中、低层级全球城市的能级水平将进一步下降,甚至可能随着跨国公司投资与经营布局的调整而退出全球城市行列,转型为地方与区域性城市。而顶级全球城市的排名与等级结构的变动亦不可避免。依据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排名为代表的全球城市排名整体情况,当前顶级全球城

市的位次排序尚未有较大变化,^①这就带来新兴全球城市地位提升与国家力量提升的不同步性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这突出地表现为中国全球城市的等级登顶问题。

从全球城市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主导性大国的力量对比变化与顶尖全球城市的能级提升往往并不同步。这主要源于全球城市的地位更多取决于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功能作用与能级优势,而非单纯依靠国家间力量对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英国早已完成国际主导权力转移,但伦敦仍然长期居于全球城市的顶尖层级,其核心原因在于该城市针对全球化的制度性创新能力及离岸金融、航运服务等战略性功能水平依然领先。而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化城市的功能与能级更多体现为枢纽与平台能力,其制度创新与专业服务能力相对有限,这就使得在以跨国公司服务需求为核心的排名评价体系中,北京、上海等高等级全球城市的排名进一步上升空间始终受到约束。

尽管以传统评价标准而言,中国全球城市的等级提升程度相较于中国的大国地位而言仍有滞后性,但在全球城市评价标准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已逐渐具备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等级登顶的潜在可能。中国高等级全球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科创资源集聚度较高,与区域产业体系具有紧密的融合程度。这种特质在全球化3.0阶段对于城市能级提升的支撑作用并不显著。但在技术变革、价值链重塑对全球城市的创新功能提出新需求的情况下,中国全球城市依靠在创新与产业领域的长期投入与基础积累,已显现出更高的响应与适应能力。如在202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城市群首度排名第一,北京、“上海—苏州”分居第四与第六,超越纽约、伦敦。^②2025年发布的“2024自然指数—科研城市”中,北京、上海分列第一、二名,前10名城市中,6个为中国城市。^③这就使得中国城市具备了凭借创新

① GaWC,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WC,” <https://gawc.lboro.ac.uk/gawc-worlds/the-world-according-to-gawc/>.

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2025年9月, <https://www.wipo.int/documents/d/global-innovation-index/docs-zh-2025-gii-2025-clusters-top100-ranking.pdf>。

③ Nature Index, “Leading 200 Science Cities 2025,” November 23, 2025, <https://www.nature.com/nature-index/supplements/nature-index-2025-science-cities/tables/overall>.

要素的国际配置能力与价值链带动能力,通过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提升,构建“服务—创新”双重架构顶级全球城市的重要条件。中国全球城市等级提升的路径创新还体现在国际治理领域。2025 年,国际调解院在香港的正式运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的建立,显示出中国的全球城市在集聚、服务全球治理新兴机构方面的积极作为。新治理机构与治理体系的建制与落地,将深刻影响全球城市国际政治职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为中国全球城市的地位提升创造新的路径。

从发展阶段来看,“十五五”规划实施的未来五年(2026—2030 年)是中国城市把握全球化迭代机遇,依托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发展势能,发挥科技创新体系、制造业基础、本土联动能力等后发优势,实现城市等级跃升的关键窗口期。中国城市“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构想与实践路径,正在为全球城市功能体系迭代与发展模式更新提供新的范式参照。以上海为例,其《“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与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加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等综合部署。^① 其规划体系反映出中国城市以系统性功能协同替代单一枢纽功能定位、以制度型开放适配全球规则体系重构进程、以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支撑复合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特征,体现出战略自主性与全球网络嵌入性相互融合的新型全球城市发展逻辑。中国全球城市的规划与实践创新,不仅为中国深度参与并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战略性空间,也将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全球城市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发展参照系。

五、结 语

全球城市是全球化的产物,也必将随着全球化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全球化向 4.0 阶段的转型,是国家、企业、社会等多层次主体对持续 20 余年的超级全球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26 年 1 月 19 日,<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60119/3650f8b3b525401b8513dfb0f7bcd424.html>。

化浪潮做出的调整和新选择。这一转型绝非意味着全球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断绝,而恰恰反映出全球交往更为深入背景下,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关系、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与“再平衡”。全球化4.0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剧烈变化与新现象,在带来不确定性的挑战的同时,也为全球化参与者提供创造新格局的机遇。全球城市的本土化、策源化、区域化和包容化等发展新趋势与竞争新逻辑,反映出国际化城市对新一轮全球化环境的响应与发展战略调整。

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如果城市能够抓住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等新技术变革机遇主动转型,主动理顺城市与国家间关系、构建新型国际枢纽功能体系,将能够争取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增量因素,进而获得新的有利地位与发展红利。同时,城市作为全球化的基本空间单元,其存在价值不仅体现在对资本与技术的集聚能力,更在于能否构建公平共享的社会体系与开放协同的治理生态。具备本土化创新能力与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的城市,正在成为新规则的塑造者而非被动适应者。一系列正在发生的转变,标志着全球城市发展范式的深刻重构。

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动、国际分工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全球化推动力量的结构性转变,为全球城市等级体系及网络节点关系的调整创造了条件。中国等新兴主导力量及全球南方国家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提升,正迎来历史性契机。这些城市依托技术后发优势、人口红利以及区域协同优势,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作用日益提升,并具备以创新能力与发展合作为基础促进全球经贸与产业体系变革的潜力。从发展模式来看,这些城市不再单纯是外部资本力量的承接主体,而是具备自主、多元融合特性的策源空间,其群体性发展将重塑全球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资源要素流向。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有助于打破国际城市的“中心—边缘”格局,加速构建多极联动、均衡多元的全球城市合作新秩序。

【责任编辑:龙菲】